



乡村是文学的沃土，人民是文艺的根脉。近一年来，我全程参与了由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与兴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编的《新大众文艺视野：山药蛋派经典作家作品选》六卷八册丛书的编纂工作。这套涵盖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六大品类的文学丛书，系统梳理收录了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六位“山药蛋派”代表作家60余年的创作精华，完整勾勒出山西本土经典文学流派的创作脉络，既是对山西红色文艺、乡土文艺的深情回望，更是新时代繁荣新大众文艺、赋能山西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山药蛋派”是扎根山西大地、极具本土辨识度的文学丰碑，更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最鲜活、最纯粹的践行典范。区别于传统文人文学的雅致疏离，“山药蛋派”自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为人民书写、为时代立言的创作初心，形成了质朴通俗、贴近现实、扎根乡土、直面民生的鲜明创作特色。这批成长于晋绥革命老区的作家，始终脚踏泥土、心系百姓，摒弃晦涩艰深的文风，以山西乡村为创作主场，以普通农民、基层群众为核心主角，用质朴鲜活、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记录乡村变迁、描摹人间百态、书写时代进步。他们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有着动人的烟火气；没有空洞的抒情说教，却承载着真实的时代记忆，真正实现了文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诠释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的核心要义。

此次编纂出版的系列丛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系统拾遗、

完整存脉、正本清源。长期以来，“山药蛋派”作品多散见于各类报刊、文集，品类零散、体系不全，大众对这一重要文学流派的认知，多局限于少数经典篇目，难以窥见其创作全貌与思想精髓。本次编纂工作打破零散化传播壁垒，全方位整合六位经典作家的各类体裁作品，从叙事生动的小说、贴近生活的文学剧本，到质朴真挚的散文、纪实写实的报告文学、思辨深刻的理论评论，多维度、立体化展现“山药蛋派”的创作广度、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60余年的创作积淀，跨越不同时代，既记录了山西乡村的社会变革、民俗风貌、民生迭代，也见证了文艺大众化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演进历程，成为研究山西现当代文学、北方乡土文学、红色大众文艺的珍贵文献宝库。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是坚守文艺的人民性，让文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赋能时代，而这正是“山药蛋派”的精神底色。在文艺多元化发展的当下，部分文学创作逐渐脱离群众、脱离现实，陷入小众化、碎片化、功利化的困境，而“山药蛋派”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供了宝贵指引。这批经典作品立足现实、聚焦大众，书写新人新事、传递时代新风，用简朴明快、接地气、接地气的表达，讲好乡土故事、传递民生温度，让文学不再是小众的精神奢侈品，而是大众可读、可感、可共鸣的精神食粮。这种扎根泥土、心系人民、贴合时代的创作坚守，正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在新时代需要持续传承、大力弘扬的核心品质。

“山药蛋派”诸多经典作品，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焕发鲜

活的艺术生命力，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且深刻的引领作用。在创作立场上，“山药蛋派”始终坚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纠正了当下创作者脱离现实、凌空蹈虚的不良倾向，提醒当代写作者始终立足大地、观照基层，把创作笔触伸向民间烟火与百姓生活。在叙事表达上，通俗质朴、真实鲜活、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感的文风，为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成熟的创作范本，启发当代创作者摒弃晦涩表达与华丽堆砌，追求文学的真诚与本真。在题材立意上，作品紧扣社会变革、聚焦时代发展、回应现实问题的创作格局，引导当代文学跳出私人化、碎片化的叙事局限，主动承担记录时代、书写现实、传递正向价值的文艺使命，为山西乃至全国的现实主义创作筑牢大众文艺的精神根基。

“山药蛋派”作为山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是三晋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山西文学走向全国的核心名片。一代代“山药蛋派”作家深耕乡土、潜心创作，构建起独具山西地域特色的文学审美体系，塑造了鲜活的北方乡村人物群像，让山西的乡土风貌、民俗文化、人文精神通过文学作品走向更广大天地。这套丛书的系统编纂，不仅是对老一辈文艺家创作成果的致敬与留存，更为当代山西文艺创作者树立标杆、提供滋养，引导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摒弃悬浮化创作，立足山西大地，聚焦时代变迁、贴近群众生活，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底蕴、有烟火气、有时代感的文学作品。

个体的聚焦与抽象的发散

——读张频频散文有感

王春林

散文是诸种文学文体中最自由的一种。除了形式层面上的挥洒自如或天马行空，理想的散文作家，也应该是一位拥有独立自由精神的思想者。虽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写作者都应该具备这一特质，但相比较而言，拥有形式自由特征的散文尤甚。

虽然接触的次数不算多，但在我的印象中，外表看上去似乎有一点柔弱的张频频，所拥有的却是一颗向往精神自由的灵魂。就我目力所及的有限篇章来看，张频频的散文基本上沿两种不同的路径展开。一类是个体生存经验的聚焦，另一类是带有抽象意味的发散性思考。

前者的代表性篇章，当属《痛》。这篇散文所集中聚焦书写的，是一位名叫承和的女性的伤痛经历。承和是谁？尽管作家在文中并没有作进一步交代，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则更愿意武断地将她理解为张频频自己的化身。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作家竟然能够对承和不慎骨折后从肉体到精神的痛苦体会到如此细致入微的程度。这样一篇聚焦个体痛苦的文章，作家从一开篇，一直到承和取快递时不慎受伤，相当长的篇幅中，叙写的却是看似与个体无关的抽象层面上对诸如“僵硬”“疼痛”“出离”的思考与探讨。由于“前一日”的出离、出离后的追踪以及引发这一切的还在持续发生影响”（其实是一种神情恍惚的状态），承和在取快递时，身体不慎失控，并导致了骨折的严重后果。虽然富有层次感地书写了承和骨折以及治愈过程中的各种疼痛，但张频频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思绪并没有停留在个体的伤痛上，而是由个体的伤痛进一步生发，充分体现出某种“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情怀，以及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存在层面上的深度思考。与以上种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承和康复后走在惯常行走的河边，竟然在桥下长椅的缝隙里发现了一枚“三齿的钉”。对这枚钉的来历，承和给出了充满善意的猜想。因为自己受过伤，真切体验过疼痛，所以便希望所有人都能避免受伤，这是承和也更是作家一种推己及人的大悲悯情怀。

后者的代表性篇章，分别是《海》《以水为题》《古老的说谎艺术》。这里且以前两篇为例稍作分析。正如标题已经显示的那样，《海》这一篇所集中聚焦的是地球上占比最大的海洋世界。应该怎么样写海？张频频首先是在一种对比的意义上凸显海的重要：“实际上不论是多么妄自尊大的陆地，都只不过是更大的岛屿而已。”不仅如此，更重要的一点是，“据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海里的”。即使是人类的胚胎，也生活在一片水中，只不过那片水被称作“羊水”。不只是巨大的海才是海，所有的“江河湖泊都是小型的海，小溪小流也是，是海换了个模样暂时待在那里”。哪怕是升腾到空中的水汽，也都算是海，至少也算海的亲属。就这样，以“海”为原点，张频频的思维逐渐地发散开去，将那些与“海”相关的“苍蝇之微，宇宙之大”全都纳入到了自己的视野之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结尾处一段极富启示性的文字：“有人以为自己与海毫不相干，从不曾与海发生任何联系，远远地处在黄土一点点堆积起来的地方，呼吸着干燥的空气，行着干脆利落的事。海从不会主动地跳出来，出现在他的意识里。但是你能避免西风东渐么。你能断定脑子里的观念和主义是生根于脚下的黄土么。”虽然没有使用问号或者感叹号这样的情

感性标点符号，但作家的深度诘问却是意味深长的。尤其是其中的“西风东渐”一语，更是点睛处所在。

既然已经“以水为题”，那么《以水为题》的聚焦点，就毫无疑问是作为生命之源的水。虽然写的是水，但一开始写到的事物，却是与水不相容的火：“火与水相对。火除非把自己燃烧尽，不然就得用水来熄灭。”不仅灭火需要水，水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如果没有水，动物们会渴，植物会枯萎，山涧、小溪、湖泊、河流与海洋会干涸。”“人会没有眼泪，人的感情大概也会枯竭。”请一定要注意，作家思维的发散性，不仅体现在她由水而联想到了水族，到苏联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电影《镜子》，到地球应该被叫作“水球”，再到水对于包括术后病人在内一切人的重要性，思维一点一点渐次扩散；更体现在她将视野最终投向水的极端形态——失控后的巨大洪水。当然，损失最惨重的，还是人类自身，因其生活秩序彻底被打破。由此而引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人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并重建对大自然的敬畏。倘若我们由此而更进一步联想到古人所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么，张频频这篇《以水为题》散文的警醒意味，也就自不待言。

年轻的张频频，今后的写作道路还很长。既然已经写出了以上这些具有相当成熟度的散文，初步显示出了与文学写作紧密相关的语言表现力（虽然还需要进一步锤炼）、不同物象之间的推想力、相对深刻的思想力（虽然也还需要有必要的提升），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凭着她的不懈努力，大概率会渐入佳境，取得更加突出的实绩。



色调红叶 傅山 绘(收录于《山水图册》)

也难以在书法上取得成就。他告诫子孙，学书首在做人，书品和人品密不可分。

他在《作字示儿孙》的跋语中提出了独到的书法理论：“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意思是，写书法时宁愿字丑，也不谄媚讨好；宁愿笨拙愚钝，也不卖弄机巧；宁愿支离破碎，也不轻浮油滑；宁愿直率天真，也不刻意安排。这是傅山对明末清初柔靡书风的批判，也是他做人和作书的主张。他反对书法浮薄流丽、雕琢安排的媚俗风气，崇尚大巧若拙、自然流露的天真意趣，并且把做人的道德气节、孤傲风骨一起注入笔墨，强调书法是人格的外化。傅山的书法理论为后人称道，被奉为做人素养与书法美学的理论圭臬。

傅山的卓越成就和人格风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熠熠生辉，代代传颂。

青峰卓立诗铭志

宁志荣

太原历史文化名人傅山，一生在文学、思想、书法、医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他淡泊名利，生活清苦，不畏强权，一身傲骨，人格伟岸，坚贞不屈，树立了学者的光辉榜样，为后世所称道。梁启超把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颀、颜元称为“清初六大师”。傅山的志向与情怀，在他的诗中有着鲜明的呈现。

傅山出身书香门第，庭训严格，性格坚毅，刚正不阿，具有侠义精神，可谓文武双全。从他早期的诗中可以一窥端倪。傅山《结客少年场》道：

快马不在肥，快刀不在长。
相许心如丹，不在面上霜。
一言快人意，千里不留停。
笑取仇家头，混迹游他乡。

……

这首诗描写了少年侠客快意恩仇、一言九鼎的情怀。一旦接受托付，即使长途跋涉，也在所不辞，哪怕流落他乡，也不反悔，揭示了少年侠客的英雄本色，也表达了傅山为人处世的志向。明崇祯七年（1634），傅山赴京为袁继咸鸣冤，连续五次上疏，并用拦轿请愿等方式进行斗争，终于使袁继咸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他捍卫正义，不畏强暴，凛凛气节，彪炳千古。

明朝灭亡之后，傅山不肯屈从，以方外身份掩护，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不料被人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清廷严刑逼供，傅山绝食九日，绝不认罪。他在狱中作《狱中树》：

狱中无乐意，鸟雀难一来。
即此老椿树，亦如生铁材。
高枝丽云日，瘦干能风霆。
深夜鸣金石，坚贞似有侔。

傅山的这首诗以树铭志，铁骨铮铮，表达了坚贞不屈的抗争精神。诗中以老椿树自况，将身世之痛与民族危难凝于一



1940年4月初，夏承焘胸中满是惆怅与愤懑：好友龙榆生投蒋汪伪政权了。夏、龙二人初识于1929年，十几年交往唱酬，情投而意合，遂成至交。两人对于近世词学研究贡献甚伟，后与唐圭璋并称“词学三大家”。对于龙榆生的附逆，夏承焘极感惋惜，那段时间他在日记中写道：“座间闻将离沪，为之大讶，为家累过重耶，抑冀高爵耶……念其临行前如得晤予，予当极力挽之回。”

抗战时期，夏承焘写了很多感时伤国的词作，其中关涉龙榆生的不少，这些词作后来被收录到1981年出版的《夏承焘词集》当中，成为纷乱时代文人复杂情感的一个注脚。

龙榆生离沪不久，夏承焘填《蝶恋花》，其中有：“青眼东皇能几久？陌路相逢，且莫轻招手。时样双眉空暗斗，谁家明镜无新旧。”劝老友何必投身魔窟，博取那靠不住的青眼相待，等到明日黄花之时，镜子里还有旧人的容颜吗？这些话，龙榆生恐怕是没有在意的。他赴南京后做了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教授，风头正盛。据两人的朋友丁宁告诉夏先生：“榆生兴致大好。”1941年底至1942年初，夏承焘在沪买盆梅，想起龙榆生来，作《洞仙歌》，讽谏老友得意忘形：“……梦里前游堕烟水。怎知归金屋，使役冰姿，浑不管、容易尊前换世？”

那段时间，夏承焘对龙榆生的矛盾心态达到顶峰。一方面，他在朋友交谈和日记中多为龙开脱，说他附逆大半是为穷困所累，并且因与龙榆生书信来往，而“颇来友朋之讥”。另一方面，他关于龙榆生的词作中，或劝诫，或嘲讽，或拒绝其招邀，明确与其政治立场划清界限，绝不将个人私谊与家国情怀混为一谈。

《玲珑四犯·过旧友寓庐感事》：“听笛江关，已过尽春鸿，还劝离筵。残柳官桥，日日送春车马。妍唱艳舞谁家？漫平扫、淡蛾如画。数燕环，一倒尘土，临影定惊腰衩。不成便没相逢梦，漏沉沉、似年逾夜。当时背面回身地，重到除凄恻。谁信镜易易寒，应相惜双鬓无价。待东窗、换了酡颜，才许袖罗重把。”其中，“妍唱”两句，讽友以媚侍人，前途茫茫。“待东窗”一句，初看矛盾：东窗怎会见夕阳？但正为其不可能，道出再无“袖罗重把”的可能。

《水龙吟·皂泡》：“九天歌唾何人？乱珠零琲风多处。斜阳影里，儿童气力，吹嘘徒苦。咒水初成，抛球难系，花梢偷度。有玲珑台阁，天斜人物，乍明灭，看来去。只道青鸾易到，仗轻风、时抬举。等闲谁料，未容着地，已随零露。扫尽繁星，一轮端正，乍惊窥户。是旧时片月，山河无恙，看胭脂吐。”且看这肥皂泡，只是仗轻风片时抬举。不难想到，未容着地，已随零露。

他写“莫访淡妆人，天寒依市门”，写“香泥委身何恨，到飘零、便不得当花看”，写“双鸳头白偏思归，莫待红桑谢了海尘飞”，句句沉郁，处处关心。那么龙榆生呢？龙先生彼时也想招徕旧友。夏承焘复函正告：“你说到南京是为了吃饭，那就只许你开吃饭的口，不许你说别的话。”这份不满，夏先生也写在日记里：“某君四出邀人，或迫于府主之命，然不当牵连幸好。”到了1944年，夏承焘对龙榆生的失望愈浓，对老友的败落也有了预感：“酒边记得相逢地，人间更没重逢事。……无泪为君垂，潮平月落时。”

1945年日本战败，龙榆生被捕，判刑12年。在他入狱期间，夏承焘多方奔走，花钱托人看顾旧友。龙终获减刑，于1948年释放。想起这些年的恩怨分合，夏承焘作《太常引·寄白门旧友》：“年年醉梦负花风，听歌最恼公。何物似情空，看别酒不如泪红。风前愁絮，尊前醒眼，往事转头空。万一有重逢，愿长在梦中醉中。”

客观来说，龙榆生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供职汪伪政权期间特地远离政治，且有策反伪军投奔我军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词学家受到照顾，几年后，担任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的龙榆生，想起当年的事，感慨万千，寄给夏承焘一首诗：“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勿勿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回。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

今年是夏承焘先生逝世40周年，也是龙榆生先生逝世60周年。仅裁几片词叶，编织这一小舟，放在二二生命长河当中，随波到岁月尽头，以纪念两位词学大家经历了至暗考验的友谊。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年轻一代受众是在高强度、高信息量的视听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反感说教，但并不拒绝深度；追求叙事速度和强感官刺激，但更渴求智性的挑战。也因此，重现或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似乎是当下青年读者的审美新特征。

——傅逸尘（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在写作中，作者的真实情感与小说人物的真实存在应当是区分开的。虽然源于作者的内心，但因为是另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自然有其独立的生命轨迹。作者要做的，是尽可能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与那个真实的灵魂进行毫无保留的对话。对人物探索得越深，与读者产生共鸣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距离那个世界的本相也就越近。

——何玉茹（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作家谈艺